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湖 南 工 运 史

研 究 资 料

第 六 辑

湖南省总工会调查研究室编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目 录

浅谈党在安源罢工中的策略……………刘善文 胡自国 (1)

水口山工人运动情况(续前)……………谢锡奇 李仲凡 (11)

· 专题材料 ·

长沙人民收回大金码头的斗争……………雷振寰 (19)

湘南暴动中永兴工人参军参战情况……………永兴县工会工运史组 (24)

解放前夕长沙工人的护厂保产斗争……………米重华 王亚元 (27)

· 人物传 ·

李六如传略……………凌 辉 苏去强 (33)

· 订正· 质疑 ·

对《水口山工人革命斗争故事》的补充和异议……………李楚望 (41)

· 经验交流 ·

我们开展工运史工作的作法与体会

……………祁东、祁阳县工运史办 (45)

我们是怎样开展工运史征集和编写工作的

……………衡阳铁路分区工会 (47)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运史略》

初稿提要(1919——1949)……………湘西自治州工运史办 (52)

· 资 料 ·

湖南省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周万明 (54)

简讯…………… (58)

浅谈党在安源罢工中的策略

安源纪念馆 刘善文

共青团萍乡市委 胡自国

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大罢工，是安源路矿（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工人阶级以独立自觉的姿态登上革命舞台的第一次公开大搏斗。“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①

这次罢工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成功范例，自有它独特的客观条件。然而，具备这些客观条件，只是使斗争有了胜利的可能，使胜利成为现实，是中共湘区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安源路矿支部经过长时间充分的调查研究、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之后，从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指导工人斗争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革新现代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它初次显示了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驾驭阶级斗争局势的卓越才能。党在安源罢工中的策略的成功，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无借鉴意义。

一、分析矛盾，从中找到策略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安源视察工运。在调查研究了各方面情况以后，认定组织罢工斗争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便亲自主持召开了党支部会议。会议经过详尽讨论，决定立即着手发动全体工人罢工。毛泽东并写信给李立三，要他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②

当时，矿局除上年欠饷三个月之外，本年又已欠饷两个月，加之物价上涨，因而过着牛马般生活的工人更加痛苦不堪。发清欠饷，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成了工人的日益紧迫的要求。七月，与萍矿同属一公司的汉阳铁厂工人，因反对武力解散工人俱乐部而罢工，并获胜利。消息传来，安源工人倍受鼓舞。路矿当局见此情形，深恐工潮延及安源，竭力图谋瓦解和强行封闭工人俱乐部，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慨，斗争情绪更形高涨。这样，领导工人罢工，不仅是湘区和安源的党执行全党政治任务的迫切需要，而且成了安源工运本身能否向新阶段发展的关键。

然而，客观需要是一回事，有没有可能实现全体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是另一回事。马

克思主义者不能只是根据革命情绪，更不能根据假设来制定策略，而必须清醒地极为客观地估计到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此时，在路矿两局一万三千多工人（安源的数千失业工人在外）当中，仅有党员十余人，团员数十人，工人俱乐部部员六、七百人，占在业工人总数不到百分之六。并且，党、团支部和工人俱乐部都成立不久，正如“一枝脆弱的嫩芽，”^③还没有经受严重斗争的考验，而绝大多数工人则继续在旧式组织（主要是洪帮）的影响和控制之下。与此相反，路矿两局除了庞大的管理和统治机构而外，矿局并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监狱，矿警即达八、九百人；站在两局背后的有北洋军阀政府和汉冶萍公司买办集团及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与两局紧密地勾结的有萍乡县知事公署、驻萍乡的赣西镇守使署及其所属大批军警，还有安源本地的地主阶级及其豢养的保卫团。安源工农群众历次自发反抗，都是被这些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绞杀的。由此看来，不论在人数方面还是在政治经验方面，党及其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都处于明显的劣势。显然，在这样的形势下，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是不可能认为罢工条件正在成熟而作出立即组织罢工的决定的。

毛泽东在创建党的活动中就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④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在革命发展的初期，向上的东西是新的质和量，它主要表现在质上；向下的东西是旧的质和量，它主要表现在量上。在社会矛盾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存在着革命力量由少数变为多数、由劣势转化为优势的极大可能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在于，敏锐地从矛盾中发现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准确地捉住时机，采取正确的政策，促成这种转化。

萍乡煤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买办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同它休戚相关的株萍铁路则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一个官办企业；并且这两个企业都处在中国内地两省边境的山区和广大农村包围之中，这个地区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封建势力受到的冲击尚微。因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安源路矿显得集中而尖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内则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国内外各种矛盾空前激化，革命情绪普遍高涨；特别是以香港海员罢工为开端的全国工运高潮，直接影响到安源路矿社会矛盾的发展。这些，就是安源罢工发生的根据。

正因为工人身受资本家、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三重压迫，“在这三重压迫下的无产阶级，他们解放的要求自然更紧迫、更激烈。”（同注③）安源工人阶级自一八九八年诞生以来就有过一系列斗争。从一九〇一年响应义和团运动，一九〇六年参加萍浏醴起义，到一九一九年六月响应五四运动，驱逐德国工程师以及痛打华洋监工，捣毁洋人住宅等等，正是他们解放的要求非常紧迫、非常激烈的表现。毛泽东早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同李立三谈话时就预见到，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⑤而事实上也正如刘少奇、朱少连在分析安源罢工发生的原因时所指出的：“安源路矿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而另一方面，工作既如是之苦、压迫既如是之重、待遇既如是之虐、剥削既如是之深：故‘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之口号一出，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集中而尖锐，不仅决定了全体工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而且决定了工人众多而高度集中又特别能战斗的突出优点。因此，只要党善于“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⑦抓住全体工人共同关心的最迫切的问题，就可以把全体工人调动起来。并且，从一九二一年秋冬以来，经过党的十个月左右的艰苦细

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工人中知识水平较高、有一定威信的先分子，已经紧紧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可以在各自的工作处充当工人群众的核心和骨干；就是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受到了革命潮流的影响。这样看来，革命力量由少数变为多数、由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

其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突出，又决定了工人阶级同其他阶级人民之间利益的一致性。路矿开办时，官僚买办依靠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圈占矿区，封闭数以百计的土井和煤厂，低价强购土地，就曾激起当地人民群众同工人阶级一起开展反帝爱国和民主斗争。由此看来，安源工人处在落后的广大农村包围之中固然是一个弱点，但如果处理得当，这个弱点也可以转化为优点。只要工人善于反映民族的和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就可以取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扩大本阶级力量的社会基础。

再次，一般地说来，阶级斗争接近决战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会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特殊地说来，安源路矿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它内部的腐败和各派势力之间相互倾轧的激烈，两个企业关系密切而又分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集团，企业的重要地位和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统治阶级内部存在某些特殊的矛盾。事实上，党在安源一开始就曾利用这些矛盾，便利了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只要继续发现和利用这些矛盾，促进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瓦解过程，就可以使罢工胜利的阻力减少。

最后，外部环境中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的有利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如前所述，全国工运的高涨，已经和必将愈益鼓舞工人的斗志，同时，也确是使统治阶级感到“近年劳工风潮，已成趋势，莫可制止。”^⑧并且，安源虽地处一隅，但有株萍铁路与湖南相通，便于工人联络和湘区党委指挥。只要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条件的作用，争取各地的声援，就可以壮大罢工斗争的声势，使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党支部会议，由于充分估计到内外环境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的一切有利因素，所以能够及时捉住时机，在有组织的工人处于少数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立即着手组织全体工人罢工。这一决定拨动了安源路矿社会中绷得最紧的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会议以后，罢工的准备工作进展极快。九月九日，李立三回到安源，随后，刘少奇也奉命到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这样，罢工斗争便成了弦上之箭。这时，毛泽东又给党支部写信，对罢工斗争的策略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党支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基本口号，制定了义无反顾的罢工宣言，加强了工人内部的组织工作，注意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制定的上述基本策略，像一条红线，贯穿着罢工斗争的始终，指引着斗争走向胜利。

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⑨党在安源罢工中的策略，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安源路矿当时的独特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的成功应用。诚然，我们党当时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理解还不深刻，对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也还没有根本的认识，但是，安源的工人运动从创办工人学校到组织路矿工人俱乐部，一开始就“谈

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事情，”^⑩到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组织第一次大罢工，表明湘区和安源的党一开始就认真地把自己的活动同工人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同安源路矿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注意吸取国内外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本民族的优秀思想资料，从而能够创造出初步具有安源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制订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策略，使工人运动一开始就初步具有本国的特色和安源的地方特色。这是安源罢工胜利的政治基础，也是它的策略基础。

二、罢工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依靠工人 自己的团结和斗争

安源工人运动发生之前，毛泽东曾经指出，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建筑在潜在切实的态度之上。他认为，黑暗的中国社会，“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必须“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⑪罢工前，党在安源的工作，正是这种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潜在切实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革命风格的生动体现。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党在工人中的实力养成了，罢工的条件也就逐渐成熟了。故在罢工斗争中，党始终把基点放在依靠工人自己的团结和斗争上。

史料表明，在罢工斗争中，为着实现全体工人团结一致地奋斗，党大致上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使工人认识团结和斗争的重要性，增强工人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在罢工的准备期间，利用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和其他各地工人罢工的事件，在俱乐部和一些工作处分头日夜演讲，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⑫说明俱乐部是县衙门立了案的，矿局也承认的正当机关，号召工人加入俱乐部，共同奋斗；工人人多势大，只要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就可以达到目的。当罢工前夕向两局提出最低限度的三条要求以后，即向工人宣传“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并竭力说明须服从俱乐部之命令，须依指挥而动作。^⑬又多次召开各处工人代表会议，研究如何保证工友齐心，严守秩序，由代表把会议研究的结果传达到工人中去。在罢工期间，继续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工人代表的个别工作以及宣言、标语等形式宣传团结一致、坚持斗争、遵守纪律和秩序、听从俱乐部的统一指挥。

第二，提出了共同奋斗的明确目标。如前所述，党根据“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了哀而动人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了！”同时，按照这一口号的精神，先后发表了两篇宣言，说明罢工原委。宣言倾吐了工人受痛苦受压迫的事实，揭露了压迫者摧残工人俱乐部的行径，说明工人是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宣言将罢工的目的归纳为三点：“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并围绕这三点提出了十七项要求，其中：属于改良待遇方面的（休假、死伤抚恤、改善食宿条件、不准殴打和虐待工人、减少劳动时间、包工改点工等）九条，属于增加工资，发清欠饷方面的五条，属于保障工人俱乐部权利方面的三条。宣言号召全体工友，为此目标团结奋斗，誓以死力对待，坚持到底，并吁请各界援助。^⑭《罢工宣言》把原

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以工人的苦难事实表明了罢工的正义性，恰当地提出了当时当地内外条件所许可的和必要的要求；既反映了工人的长远利益，又突出地强调了当前的迫切生活问题；既表达了先进工人的意愿，又照顾到广大工人以致其他人民群众当时的觉悟程度，从而不仅激发了广大工人的斗志，而且博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

第三，争取洪帮的支持。洪帮问题是安源工人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洪帮在安源的势力很大，矿局不得不给洪帮头子挂上“顾问”的头衔，包工头中不少是洪帮的各级头目，以致不入洪帮便难以在安源立足谋生，因而工人中加入者极多。所以，不做好洪帮的工作，便很难实现全体工人的团结一致。党早就注意到争取洪帮的下层群众，并且在罢工前就有一、两个小头目加入了我们的党。罢工爆发前夕，李立三由洪帮小头目陪同，会见了洪帮头子，同他共喝雄鸡血酒，互称兄弟；说明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希望他讲义气，给予支持，并要求洪帮做到三条：一、关闭鸦片烟馆，二、收起街上的赌摊，三、保证不发生抢劫案。洪帮头子当即欣然答应，并将前两条写成布告贴出去。”^⑮罢工爆发后，由于洪帮如约实现了上述三条，又由于工人俱乐部监察日夜巡逻，维持秩序“即非工人之在街上赌钱者，见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便都四散。”^⑯社会秩序井然，初次显示了工人阶级治理社会的卓越能力。争取洪帮的成功，不仅保证了全体工人的团结奋斗，而且对于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加强工人的组织，制定严明的纪律。首先是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罢工中的各项重大问题，从决定罢工到具体部署，都是由党支部开会（团支部派人参加，有时则以团支部名义开会）讨论决定、由工人俱乐部具体执行的，党、团员则分头担任各种职务，贯彻党的意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除湘区委员会通知支部书记李立三立即回安源领导罢工，加派刘少奇到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外，罢工前夕，党支部举行会议，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因李立三早已公开露面，为了防止意外，决定他秘密策应，而由刚到安源的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代表，驻部应付一切。同时，扩大了工人监察队（即后来的纠察队），组织了侦探队。监察队佩带符号，手执白旗，满布街市和工厂附近，日夜巡逻和守卫，对内执行纪律，对外维护秩序，防止坏人破坏，准备随时与敌人作公开斗争；侦探队则四出秘密探听消息。并规定工人“各归住房，不得扰乱”，服从统一指挥，“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等项纪律，布告各处一体遵行；同时，每工作处（两局共有四十多个工作处）派一名代表常驻俱乐部上传下达消息和命令。这样，恰当地把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组织，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以党支部为核心，以团支部为重要助手，以党、团员为骨干，以工人俱乐部为公开组织形式的全体工人团结一致，“遇有事故，即一呼数百，如臂使指。”^⑰

第五，制定和执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战斗部署。在斗争的全局上，首先向当局提出了最低限度的三条要求，限期作出圆满答复，否则，“当为最后之对付，”^⑱当两局第一、二次答复均不圆满，而罢工的准备尚未完全做好时，又增加条件，要求两局作第三次答复。由于两局未在限期内作出第三次答复，而罢工的准备又已经完全就绪，于是立即发出罢工命令。罢工开始后，又按照部署，保持锅炉房、电厂、抽水机和打风机等要害部位的正常开工，或部分开工。这种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和区别对待的做法，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同时，罢工之前做好了充分准备，罢工一经爆发，便领导工人粉碎敌人的威胁和利诱的种种破坏手段，与两局的“先开工后磋商条件”的企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先磋商条件后

开工”。由于斗争节节胜利，步步进逼，工人斗志愈加昂扬，而敌人愈益陷入困境。当两局锐气已倒，答应了大部分条件，特别是答应了全部主要条件时，便在不损害工人的长远利益的前提下，作适度的妥协（提出十七条，最后签订了十三条协定），适可而止，以保持工人斗争的锐气。为了防止意外，除如上述把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之外，罢工前夕并将俱乐部各种重要文件和办事机构转移到秘密地点。这样，在斗争的全局上，既决心争取可能的最大胜利，又注意到适度的和必要的妥协，还随时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险要情况，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在具体步骤上，选择了凌晨换班的时间（路局工人是二时换班，矿局工人四时换班）为罢工开始的时间。因为换班时才便于上、下班工人一齐行动，而且因时值深更，两局职员也比较懈怠，便于工人行动。十四日凌晨二时，路局工人停开了由安源通往株洲的首次列车，发出信号，率先罢工。矿局工人闻讯，将电线砍断，向井下工人发出信号。于是上班的工人一齐涌出矿井，高呼罢工，早班工人则一齐不上班。此时，工人监察队员用煤桶和木柴等堵住井口，严加把守，只准出班，不准任何人下井。当矿局职员、工头以下井不做工也照付二元钱一天的手段引诱少数工人（其中多是与职员、工头有亲谊关系者）下井时，监察队则任其在井下饿困，不准其出井。最后由俱乐部下令放出，详加劝导，令其改悔。于是再无一人敢自行上工者。由于时机选择得恰当，措施严密有力，这样就保证了全体罢工的迅速实现和坚持不懈。

第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特别是党的领导者身先士卒，在战斗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罢工前夕，当两局对俱乐部领导人施恐吓手段，妄图吓走俱乐部领导人而达到瓦解俱乐部的目的时，朱少连、蒋先云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光明正大之事业，死也不怕！”李立三回到安源后，态度更为坚决，誓死不离安源。党的领导者们英勇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获得了群众的拥戴。当工人得知矿局密谋刺杀李立三时，一面宣言若俱乐部主任被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一面严加警卫，俱乐部领导人外出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必有数百工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出入，以资保护。罢工爆发后的第三天，即九月十六日，当戒严司令和路矿当局武力胁迫工人代表刘少奇答应先开工后磋商条件时，刘少奇不畏强暴，据理严词驳斥。此时，有数千工人赶来将戒严司令部团团围住，声言若敢动工人代表半根毫毛，便要打得两局片瓦不留。这样室内室外相互配合，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所有这些事实，都生动地显示了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在保证全体工人团结奋斗当中的重要作用。

三、利用矛盾，团结多数，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

在把基点放在依靠工人的团结和斗争的同时，党一开始在安源工作就注意到利用统治阶级中的矛盾，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在创办工人夜校时，曾利用办平民教育的合法地位，由湖南平民教育机关介绍到安源，并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安源商会内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帮助，呈报县知事公署立案，由县知事出布告保护办学；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也曾呈请县署立案

出示保护。这些对于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罢工斗争中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的策略，正是上述做法的继续和发展。

要得到别人支持，首先自己要有足够的力量；要使同盟者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前面我们说到，客观条件造成了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可能性，而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战斗部署上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这是罢工斗争能够得到广泛的社会同情、对统治阶级产生威慑和分化瓦解作用的基础。同时，哀而动人的口号，义无反顾的罢工宣言，严明的组织和纪律，先礼后兵、据理力争的战斗部署，万众一心的决死反抗，等等，这些调动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奋斗的有力措施及其实施结果，无疑地也包含了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意图，并且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除此之外，党及时组织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罢工准备阶段提出的三条最低限度要求，宣布罢工的电报，罢工宣言等，都及时寄往长沙，由湘区委员会和工人团体帮助在长沙、汉口等地的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陆续向报界发表罢工消息，刘少奇曾撰写了《萍安罢工五日记》的通讯，在北京《晨报》上连载。党的湘区委员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名义给安源工人拍来电报声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全国各地许多工团也先后函电声援。这些声援函电也都在报上发表，从而扩大了罢工的影响，壮大了罢工斗争的声势，对于迫使路矿当局不敢轻举妄动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再次，由于运动开始创办工人学校时，李立三就曾通过熟人和同乡的关系，得到过安源商会里的头面人物的帮助，又由于罢工斗争不触及地方商绅的利益，并且工人增加工资，以及俱乐部使社会秩序空前良好，对商绅也有好处，因此地方商绅对罢工斗争有可能采取同情或中立的态度。党抓住这一点，继续做商会的工作，并且获得成功。罢工一开始，俱乐部就通知路矿当局：“如欲调商，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⑮事实上，地方商绅在罢工的谈判过程中的中立态度和调停作用，对于罢工的胜利，确是起了一定作用。

军队同路矿当局本来是相互勾结又不完全一致的。军队的责任是维持地方秩序，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对军队无损，故有可能使它中立。由于《罢工宣言》明白宣布罢工仅仅是为了增加工资，“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并且正是罢工爆发以后由于工人俱乐部的努力才使社会秩序井然，这就从舆论上剥夺了敌人武力镇压可能利用的借口。罢工爆发之后，工人对军队的镇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又严格限于防御和自卫，同时对军队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当矿局以每人二元钱一天，请来军队数百，占住俱乐部和各重要工作处时，即时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并向士兵们宣传：你们当兵的和我們做工的一样，都是为了挣钱养活家小，你们为什么要帮助有钱的老板压迫穷苦兄弟呢？士兵无法，只得从后门鼠窜而出，并说：“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我们不过是王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有一次，一位工友被军队拿去，不一会就有数千工人将军队围住，迫使军队释放该工友后，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大家便散了。这种策略，在当时当地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在敌人武力威胁面前示弱，就会助长敌人威风，挫伤工人的斗志，然而一味与军队硬拼，对罢工斗争也不利，至于向军队主动进攻则更符合当时的情况（还没有武装起义的条件）。党的这一政策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例如，九月十六日上午，戒严司令李鸿程杀气腾腾地威吓工人代表刘少奇：“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又叫嚷要用万余军队来制裁万余工人。可

是经过刘少奇和包围戒严司令部的数千工人相互配合地坚决斗争之后，当天下午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俱乐部，竟然“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人，请从速解决。”^{①⑨}据《略史》记述：“李旅长（即李鸿程——引者注）盖亦知工人此举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此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出力甚多。”^{②⑩}

路矿当局的首领分别是交通部和汉冶萍公司买办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们同主子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但工人只是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并不直接危及他们个人的利益，因此，也有可以利用的因素。“且路矿两局职员内部分为数派，对于此次大罢工，都想利用俱乐部将敌派打倒而自握实权，暗中与俱乐部接洽者，时有其人。”（同注^{②⑩}）对于上司，则“甲党打电报攻击乙党，说此次罢工风潮由他们酿成，乙党亦如之”。^{②⑪}特别是矿长李寿铨同副矿长舒修泰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党利用他们之间这些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在罢工前夕，副矿长舒修泰到俱乐部探听虚实，一面恐吓，一面又以给俱乐部津贴经费和房屋为言，希图笼络，借保无事。俱乐部领导人不为所动，反而向工人大为宣传：“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②⑫}因此消除了许多工人对俱乐部的疑虑。罢工期间，对于路矿两局，着重揭露矿局，对路局则比较缓和，在矿局内部，利用正副矿长之间的矛盾，使其就范，狠狠地孤立和打击了工人最痛恨的，破坏罢工又最猖狂的总监工王鸿卿。对其他职员和大多数工头均采取利用、争取其同情或中立的政策。

由于工人的团结战斗和全国各地工团声援的威慑，也由于党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原来被请来镇压罢工的萍乡驻军最后采取了调停的态度，赣西镇守使署也奉到省督军促囑和平解决的电谕；地方商绅则一开始就居中立的地位；路局方面，当时在北京的局长王昌学、在长沙的副局长肖五琴，均来电力主和平解决；矿局内部意见极不统一，有主张言和的，有主张拒绝谈判的。它的上司汉冶萍公司首脑机关则远在上海，鞭长莫及，而控制这个公司的日本帝国主义此时对维持萍矿已不大感兴趣（因大战后世界钢铁市场不景气，且日本国内已建立钢铁厂，只需大冶矿石，不再需要汉阳的钢铁，故此也就对公司的煤焦生产不关心）。最后，矿局内部的强硬派因势孤力单，拿不出对抗罢工的实际办法，也只好同意与俱乐部签订协议。

四、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

这次罢工斗争，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为着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向厂主的宣战，而不是向政府宣战，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和必要的斗争。然而，党并不是孤立地看待经济斗争，而是把它看作是引向更高斗争形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正如刘少奇在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时总结工运经验时所说：“工人以罢工手段要求普遍的增加工资和减少工头职员无理的压迫与剥削，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乃是一种手段，即是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②⑬}这一指导思想，在党组织罢工斗争中始终是很明确的。

首先，罢工宣言不只是用工人的苦难事实来博得人们的怜悯，而且把工人苦难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的黑暗，指出：“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在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

的地方。”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但实质上已经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这就使工人的眼光不局限于增加工资，而能看到未来的战斗。同时，也有利于争取一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家压迫的人们支持。

其次，从罢工中提出的条件来看，大部分是涉及工人群众日常生活中直接利益的，这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工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但宣言中把“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放在第一条。并且谈判中，对这一条坚持最力，最后作为第一条写进了三方签订的协议，从而争得了团体契约缔结权。这不仅有利于工人的经济利益，而且使工人群众组成为一个阶级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就第一次“把雇主们看作一个阶级来对抗，”使工会运动“真正变为阶级的行动。”^{②4}

再次，为着使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在庆祝罢工胜利的群众大会上，李立三宣布了十三条协议之后，便初步总结了罢工斗争的成功经验，他着重指出：“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并指出群众还有许多的痛苦，“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工人俱乐部发布的《上工宣言》也指出，这次罢工胜利只是“第一次胜利，”号召工人“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②5}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祝贺安源罢工胜利的信中则更进一步指出：“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书记部号召工人为达到终极胜利而继续努力奋斗，并以“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作为贺信的结语。^{②6}这样就使工人对“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有了新的理解，“从前是牛马”，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掌握政权和产业；“现在要做人，”不只是一要改善目前的待遇，而且要做社会的主人；不仅要中国做社会的主人，而且正如《国际歌》中所说的，“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罢工胜利后，党及时领导工人总结经验，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由于罢工胜利，工人“对于自己利害相关的团体——俱乐部——之信仰与保护，亦迹于最高的程度了，于是全体万余工友均争先加入俱乐部。俱乐部乘此重新改组，选举各级代表及职员。”^{②7}并在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设立了分部。俱乐部所属纠察队、学校、合作社等组织也都大大地发展了。同年十月，俱乐部领导工人粉碎了职员工头组织的游乐部，取得了打破包工制的胜利；之后又领导湘东永和煤矿和株洲转运局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并使工人的斗争从厂内向着厂外，支援水口山、大冶等处工人的斗争。在此基础上，分别参加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和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筹建工作，为工人阶级的联合作出了贡献。在领导这些组织工作和斗争中，党、团组织本身也得到了发展，并于同年冬次年初成立了党、团地方委员会。至此，工人运动第一阶段的任务——团结工人阶级自己基本实现。安源大罢工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十三条协议”），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②8}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基本原理中，有两个论点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论及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工人维护自己的联盟，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无产阶级在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中，要为“未来战斗”准备自己的力量；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政治任务时提出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②9}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由

于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安源党支部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具体应用于当时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安源罢工斗争也就能把目前的斗争同未来的斗争恰当地衔接起来，使安源工人运动的初期，“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在工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斗争的同时，也就孕育着未来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的因素；在罢工中发挥工人纠察队和侦探队的战斗作用，在同敌军对抗时又注意分化瓦解官兵的工作，由此得到启发，后来长期坚持和发展纠察队和侦探队，并派党员到矿警队开展秘密的兵士运动，这些就是未来武装斗争的萌芽；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这样就萌发了未来统一战线的要素；在整个斗争中，党支部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党及其助手青年团的组织通过斗争也获得了发展，这就为未来党的建设创造了最初的宝贵经验；党在安源罢工中策略的成功，则为形成“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慎重初战”，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等著名的策略思想，提供了最早的素材。安源工人运动史上波澜壮阔的斗争，正是由这些“因素”和“萌芽”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对安源大罢工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初期创造了执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成功范例。

注：

- ①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一九二三年八月），见湖南人民出版社《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161—162页。以下分别简称《略史》、《史料》。
- ②李立三：《看了“豫原”以后》（原载一九六三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见《史料》第701页。
又据《略史》记载（见《史料》第149页）、朱锦棠回忆材料（藏安源纪念馆）。
- ③《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言》（一九二三年九月），见《史料》第85页。
- ④《毛泽东给蔡林彬》（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 ⑤李立三：《看了“豫原”以后》，见《史料》第700页。
- ⑥《略史》，见《史料》第147页。
- ⑦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97页。
- ⑧汉冶萍公司副经理就安源罢工风潮给公司董事会函（1922年10月11日），见《史料》第617页。
- ⑨《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0页。
- ⑩《略史》，见《史料》第148页。
- ⑪《毛泽东给罗学增》和《毛泽东复李思友》（均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 ⑫⑬《略史》，见《史料》第149页，151页。
- ⑭见《史料》第152—154页，157页。
- ⑮李立三：一九六二年六月回忆安源罢工。见《史料》第697页。
- ⑯《略史》，见《史料》第156页。
- ⑰见《史料》第65页。
- ⑱《略史》，见《史料》第154页。
- ⑲⑳《略史》，见《史料》第156页，158页。
- ㉑《安源路矿罢工之经过情形》（1922年9月21日长沙《大公报》，见《史料》第519页。
- ㉒《略史》，见《史料》第148页。
- ㉓刘少奇：《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见《史料》第120页。
- ㉔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
- ㉕②⑤见《史料》第160页，161页。
- ㉖《略史》，见《史料》第162页。
- 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
- ㉘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29页。

水口山工人运动情况(续前)

1922—1927

谢锡奇 李仲凡

七、工农大联合

早在一九二三年春，毛泽东同志就指派水口山工人党员刘东生、谢怀德赴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到达岳北后，与农民紧密结合，经过串联发动，很快建立了拥有数万农会会员的“岳北农工会”。第一次实现了工农大联合，有力地促进了水口山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的胜利进军推动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十月，中共湖南区委作出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十一月，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发布了“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决议案”明确地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的系统的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党派何叔衡到水口山，向全矿党员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号召大家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以水口山为中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十二月一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毛泽东同志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还严厉地斥责了“惰农运动”之类的反革命宣传，并提醒大家：现时湖南虽然是由国民政府统治，但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从而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以及斗争的艰巨性。水口山矿工会派刘汉之、杨汉章、李福田、余庆甫等四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斗争的实践，使水口山工人进一步明确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提高了对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的认识。大家深深懂得：工人阶级在摧毁旧世界的征途中，如果不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同盟军联合起来，如果不去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结合的反革命势力。因此，矿工会建立以后，一方面举办工运讲习班，加紧训练工会干部；一方面举办工人师范班，培训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宋乔生、杨发秀、雷发徕等一批工人骨干和部份家住附近农村的工人，在陈章甫、刘汉之、涂国钦、黎海云、沈良波、江万树、谷佰珊等同志率领下，深入水口山周围各个村庄，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发动广大农民燃起了熊熊的革命

烈火。

那些一贯骑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土豪劣绅，听说水口山派人到农村组织农民运动，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妄图使用种种毒辣手段进行破坏和捣乱。

水口山工人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与广大农民并肩战斗，同反动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地处水口山西南二十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官庄。这里的农民听到北伐军打到了湖南，水口山的工人又“重见天日”了，衡山那边的农民都在搞农民协会，大家都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也要干起来。陈章甫、杨发秀等到达这个村里开展宣传以后，大家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该村的一个锯匠谷雨亭，早年曾在水口山当窿工，因参加罢工被开除，后又回到农村。这时，当他知道上级党组织指示要以水口山为中心，派出工人骨干把附近的农友们都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与乡里的土豪劣绅斗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决心带头响应党的号召，紧密配合水口山工人积极开展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全村的农民很快就行动起来了，向土豪劣绅展开了斗争。

该村土豪劣绅谷玉衡，欺压百姓，心毒手狠，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谷剥皮”。他知道农民们要成立农会，慌忙派出他的走狗到处放风说：“一笔写不出两个‘谷’字，谷家的事谷家管，不要外人插手”。“都是乡邻乡亲，何必豆箕相煎过不去呀”。“谷老爷倡议精诚合作，振兴官庄”。一时间，搞得满村风雨。

陈章甫、杨发秀、谷雨亭等知道这事后，气得咬牙切齿。他们想，年关快到，乡亲们身无分文，就先叫谷剥皮来个“合作”吧！于是带领几十个农民涌进谷剥皮的家里，抄了谷剥皮的家，给了谷剥皮当头一棒。

谷剥皮被农民抄家后，更加怀恨在心。他与该村其他几个地主老财和几个二流子串通一气，组织一个假农会——“官庄农友会”。当他们成立“官庄农友会”的那天，杨发秀和谷雨亭等又一次带领农民们冲进他们的会场，当场揭穿了他们的阴谋，砸烂了“官庄农友会”的牌子，摧垮了假农会。

经过一个时期的宣传发动和准备工作以后，官庄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谷雨亭担任农民协会委员长。成立大会在谷家祠堂召开，会上，水口山工人代表和谷雨亭先后讲了话，指出农民协会是贫苦农民的靠山，号召大家要扎紧把子齐心干。农民协会成立后，在水口山工人宣传队的协助下，谷雨亭带领农民开展了封仓出谷、阻禁谷米出境、减租减息等活动。农民们扬眉吐气，地主豪绅威风扫地。

经过水口山工人几个月的宣传发动，到一九二七年春，水口山附近的松柏、大渔湾、凉水、蓬塘、烟州、沙坪、独石、黄石、朱坡塘、矮岭、小岭、麻石、良合、陈家湾、曹家冲、洲上廖家、香花坪等地农村也都先后燃起了革命烈火，连同官庄一起，共成立了十八个农民协会，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与此同时，水口山矿工会还先后派出了一批骨干分赴衡山、衡阳、醴陵、宝庆、祁阳等地开展农民运动。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党组织的扩大，同年三月，经上级批准，正式建立了中共水口山地委。地委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工农联合大会，公审土豪劣绅谷玉衡、何遥清，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以进一步提高群众觉悟，团结工农，促进革命的深入发展。

矿工会派出工人纠察队配合农民捉拿土豪劣绅，谷玉衡吓得躲到了离官庄二十多里远的一个大劣绅家里，被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跟踪捉拿到了水口山。同时还捉到了土豪劣绅何遥清、谷佰金、廖云南。

五月一日，天气晴朗。这一天，水口山矿区和附近农村，显得特别热闹。在矿区四十八间（地名）前面的大坪里，用松枝彩纸扎了一个主席台，台的两旁贴着一副大红对联：“有主义，有策略，有计划，怕他江山铁桶”；“不贪财，不怕死，不松气，看我好汉英雄”。台额上挂着横幅：“五一”公审大会”。八点钟左右，矿山工人和附近农民、学生、商人、排着队，扛着梭标、短棍、鸟铳等武器，拿着三角纸旗，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共计有两万余工农群众参加了大会。

会上陈章甫向大家讲了“五一”节的伟大意义，回顾了几个月来水口山地区工农运动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指出：虽然北伐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国际帝国主义还没有打倒，军阀政治的社会基础还没有打破，工人们依然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农民还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号召大家继续努力，为打倒豪绅地主，消灭一切封建余孽，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取得乡村政权而奋斗。接着，他宣布公审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一个是官庄的谷玉衡，一个是烟州的何遥清。几个背梭标的纠察队员把谷玉衡、何遥清押上了审判台。顿时，台下响起了口号声：“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几十个农民涌上讲台，争着控诉这两条毒蛇的罪恶。最后由陈章甫代表水口山区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宣布了这两个土豪劣绅的罪行，判处了这两个家伙的死刑，当即由工人纠察队员押到火车坪枪决了。会场上又一次响起了“打倒土豪劣绅！”“无产阶级万岁！”“工农大团结万岁！”的口号声。

会后，举行了示威大游行。小火车载着几十名纠察队员徐徐地向前开动，雄壮的队伍跟随火车在水松（水口山——松柏）铁道上行进。游行队伍到达松柏后，一部份纠察队员和工农群众乘势捣毁了英国、德国的天主堂和洋行，赶跑了洋鬼子，在天主堂和洋行的大门口贴上了“打破帝国主义营垒”；“造成无产阶级江山”的对联。不久，又镇压了土豪劣绅谷佰金、廖云南。工农运动已在深入发展。

八、向反革命势力宣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湖南的官僚军阀、土豪劣绅也举起屠刀开始向革命人民反扑了。党决定：各地迅速建立工农武装，拿起刀枪，反击反动派，向反革命势力宣战。不久，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在东洋渡兵工厂视察工作后，来到水口山，召开了党团负责人会议，讲解全国形势和应变策略。他说：“我们的工作要跑在时间的前面。当务之急是要迅速解除反动透顶的矿警队的武装，争取成立自己的工人纠察队，为衡阳地区成立三个工农师作好准备”。根据这一精神，水口山党组织及时召开了工农代表联席会议，研究了具体措施。接着，于五月中旬，先后举行了三次工农联合军事演习。第一、二次演习时，都请矿警队派人出面维持了秩序。举行第三次演习时，事先在矿工会办公楼上召开了工农骨干会议，由党组织负责人向大家说明了这次演习的主要任务是解除矿警队的武装，建立工人自卫队。同时，由陈章甫同志以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的名义通知矿警队长黄尧尧与两个排长到市党部参加紧急会议，把他们监视起来。接着，总指挥涂国钦向工农夺枪队伍宣布了进行演习的目标、路线和战斗纪律，将全体演习队员分成三路纵队，抢占粮子岭山头。第一路由中共水口山地委委员江万

树率领，从老鸦埠上山，第二路由刘汉之率领，从茅棚街上山，第三路由涂国钦率领，从火车站上山。

一切布置妥当后，三路队伍立即向着目的地前进。其他矿工和农会会员，扛着“武器”跟在后面，儿童团的团员们也在后面摇着三角小旗，呐喊助威。当三支队伍都到达山头，逼近矿警队的时候，忽然响起了雄壮的冲锋号声，领队的涂国钦、刘汉之、江万树等齐声高喊：

“同志们，继续前进，冲呀！”队员们听到号声和喊声，更加勇猛向前，推倒木围，撞开门窗，打翻岗哨，潮水般地涌进了矿警队。

这时，矿警队的士兵还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在他们惊慌万状的时候，涂国钦大声喊道：“你们不要怕。你们都是工人农民，我们不打你们。我们是打反动派的。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就有你们的出路。出来吧！”矿警们战战兢兢地走出来，放下了武器。不到一小时，“演习”结束了，战果是缴获长短枪支八十五支，子弹一百多担。工友农友们个个喜气洋洋。紧接着又公审了矿警队长黄宪尧。

黄宪尧是矿局局长黄荃的一条忠实走狗。他长得方头尖咀，两颗门牙咧在嘴外。平常，他穿着一身黄色军衣，脚踏一双牛皮大靴，走起路来摇头摆尾，活像一条疯狗。因此，工人们都叫他“黄狗”。他对工人一贯骄横凶暴，做尽坏事。当革命势力高涨的时候，他表面装得很老实，背地里却和黄荃一道阴谋破坏革命运动。他曾向黄荃许愿，“搞垮工会有何要紧，拿八百块钱来，我包打工会”。因此，工人们十分痛恨他。

现在仗势欺人的“黄狗”，被纠察队员揪到了台上。当刘汉之宣布黄宪尧的罪状后，群众愤怒高呼：“打倒八百元包打工会的黄宪尧！”“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农民协会万岁！”“工会万岁！”

会后，给“黄狗”戴上了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八百元包打工会的黄宪尧”，由几个纠察队员牵着，打的打锣，喊的喊口号，游遍了水口山，斗了个痛快。然后，把他关押到纠察队，经人写了保状，才把他放了。后来，他逃到猪头山煤矿去了。

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马日事变”，敌人疯狂地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以及一切革命组织，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马日事变”后，为了反击敌人，保卫革命，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决定，组织广大工农武装进攻长沙。当时，水口山矿工会赴省的同志回来后，向党组织汇报了事变的经过，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这时，刘东生也从衡山来到了水口山，提出了岳北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攻打衡阳，进攻长沙的计划，要求水口山工人武装队伍配合作战，并强调指出：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将来历史上一定会有水口山工人的一页的。刘汉之等即召开了工人骨干会议（陈章甫在“马变”前已赴省委商讨时局，没有回局），决定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力量，进攻衡阳，挺进株洲，积极配合全省各地工农武装攻打长沙的战斗。

巧袭粮子岭以后，矿工会即将缴获的枪枝弹药武装了工人纠察队，由涂国钦负责，日夜进行训练。这时，又安排打铁房赶制了大批梭标，将全矿工人一并武装起来了。在原来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组织了一支近两千人的攻打衡阳、支援长沙战斗的工人武装队伍，并成立了指挥部，由刘汉之、涂国钦等担任正副总指挥，下设四个大队。另外，还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和宣传队。指挥部决定，第一大队为先锋队，携带较好的武器，从水路进发，其余各队从陆路进军。

六月初的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涂国钦把近两千人的工农武装队伍集合到矿工会前坪，进行了动员，宣布了蒋介石，许克祥叛变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罪恶事实，说明了攻打衡阳、支援长沙战斗的重大意义。工人们斗志昂扬，口号震天：“打到长沙去！活捉许克祥！”“消灭反动派！”之后，近二千人的工人武装队伍，在涂国钦、刘汉之等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衡阳、长沙挺进了。

先头部队到达车江后，遭到了驻地敌政警队的阻击，他们随即将队伍散开进行反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未分胜负，正在紧张战斗的时候，大批梭标队伍赶上，配合作战，将敌政警队赶跑了。队伍正准备向衡阳进发时，指挥部突然接到侦察员的报告，说许克祥的大批军队开进了衡阳城，指挥部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我们的枪支弹药少，如果和敌人硬拼，会造成重大伤亡，还是达不到目的，不如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再回师衡阳。当即决定：将部分年老体弱和缺乏武器的工人撤回矿山。由涂国钦、刘汉之、宋乔生等率领全部纠察队员和年轻力壮的工人共约六、七百人攻打常宁县城，收缴团防局的枪支。他们率领这支队伍连夜出发，在天明以前即赶到了常宁县城。但是，狡猾的敌人早已闻讯，将城门紧闭死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后，又只得撤出了战斗。

后来，根据“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的指示，水口山的工农武装被迫撤回。工农武装撤回后，遭到了敌人的反扑，许多工人、农民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惨杀。“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九、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水口山工农武装从常宁县城撤回矿区以后，随即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了。

六月底何寅修到长沙，向省委负责人汇报了情况。省委当即派何寅修回水口山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何寅修回到水口山后，恢复了三个党支部，成立了特别区委，直属省委领导。七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派洪大鹏来矿工作，不到半月，由于叛徒告密，惨遭敌人杀害。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矿局局长余煥东强迫所有职员、工人都填具保单，实行五户联保，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矿区。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坚决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拨正了革命的航向，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会议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时刻，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组织农民暴动。“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秋收暴动。使水口山工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不久，湖南省委又先后从衡山岳北农工会等地派党的干部张云贵、李玉荣等来山加强领导。这时，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建立了水口山矿山特别党支部，由宋乔生任支部书记。当时，为了适应秘密活动的需要，派黎海云回长沙小吴门他老家设立秘密联络点，加强与上级及有关方面的联系。同时，由宋乔生发起，由工人自动凑钱在火车坪租了一栋民房，开设一个“合记酒店”，作为党组织在矿区的秘密联络站。酒店一列三间，前一间作铺面，中间一间是工作人员张云贵夫妇的住房，后面一间是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的地点。负责联络站领导工作的是宋乔生等。他们在这个不引人注目的酒店里，积极组织开展了武装斗争。为了隐蔽精干，积